

李时人 著

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

中华书局

叶人 著

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 / 李时人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10

ISBN 978 - 7 - 101 - 09651 - 4

I. 中… II. 李… III. 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9574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 |
| 著 者 | 李时人 |
| 责任编辑 | 俞国林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3½ 插页 2 字数 540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651 - 4 |
| 定 价 | 98.00 元 |
-

弁 言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我有如下的一些基本看法,这些既是我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产生的认识,也是我论述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小说史问题的理论基点:

(一)作为文学样式的散文体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和人类成年的艺术,人类文化及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应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此为世界范围内文学发展之规律,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概莫能外。那种认为小说在中国古已有之,或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提前到两汉魏晋的说法,实是无视文学发展规律的自说自话,不仅有违学理,对于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建设和深入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在中国,叙事艺术是经过长期积累,到7—9世纪的唐代才成批出现在形式体制和美学品格上都达到散文体小说要求的作品,唐代以前叙事艺术的积累过程,则形成了中国的“小说前史”。

(二)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上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这两种不同“语体”的小说,实际上是同源异流,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的总体格局和历史景观。这里所谓“同源”指的是两者同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所谓“异流”指的是两者有各自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形成发展道路——虽然同处于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二水分流”中难免相互影响。

(三)中国古代小说是在中国古代发生的一种文化和文学事象。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我们民族不同于世界其它各民族的历史演进形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与其它国家和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渊源形成,还是演进发展,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大不相同。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如经世阐道的创作观念和人伦道德的基本主题、诗文杂揉的

体制和双重审美要求、史传化的小说结构模式和借鉴史传的手法、重情韵尚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本体意义小说美学的缺失等等。有鉴于此,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理应提出契合自身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的理论、方法,脱离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盲从或者套用他人的理论、方法,显然是邯郸学步、不得要领的。

(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用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风俗史、心灵史。如果将小说置于民族的全部文化中,则小说就不仅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因此,人们应注意小说审美价值以外的其它文化价值。即使是那些艺术上几乎毫无可取的小说作品,作为一种文化遗存,也可能因其具有一定的文化内容而成为人们认识历史文化甚或探索民族心灵历程的资料——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似乎更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因为除了为数不多的,卓然于时代、闪烁着美学创造光辉的典范作品之外,很多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价值实际上远逊于它们的文化资料价值。但这种对古代小说的文化观照,应该站在时代文化的高度上,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而不是以今例古、随心所欲。

以上一些看法,我在已经出版的著作和发表过的论文中都不同程度地有过表述。1980年,我因偶然的机缘,进到高校中文系教书,得以介入古代小说的研究。最初几年,我在教学之余,主要从事白话小说的研究,五、六年以后,又开始了文言小说的研究。在十余年的时间内,我发表了一些论文,也陆续出版了《〈西游记〉考论》、《〈金瓶梅〉新论》、《李汝珍与〈镜花缘〉》、《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等论著,编纂过断代小说总集《全唐五代小说》,主编过《明清小说鉴赏辞典》,还与何满子先生合出过《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我曾多次想过,应该根据我自己对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史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认识和理解有不少是与先哲和时贤不完全一致的——撰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曾多次与何满子先生谈过古代小说史的撰写问题。何先生原与出版社有过《中国小说史》的约定,也转给了我,以致以后几年,出版社每年都来信来电询问完成情况。只是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因一些特殊的原因,转入了古代文学研究另一个领域——对明代作家、明代文学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包括编纂《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以及完成与此相关的其他几部著述——因为集中精力于这一课题已经十余年,所以不得不长时间地搁置了《中国小说史》的撰写工作。

不过,在这十余年时间内,我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关注,特别是因为我指导的研究生中有一个“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研究”的方向,授课和指导论文都要涉及到古代小说,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思考一些有关中国古

代小说研究的问题。这本论文集中有十篇文章即是我为已经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序言(大多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其中:

为1996级关四平博士学位论文《〈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写的序言是《〈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及社会精神现象》。

为1998级陈松柏博士学位论文《〈水浒传〉源流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写的序言是《〈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

为1998级聂付生博士学位论文《冯梦龙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写的序言是《关于冯梦龙研究》。

为1999级俞钢博士学位论文《唐代言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写的序言是《唐代言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

为2000级王言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16—18世纪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写的序言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衰及其研究刍议》。

为2001级俞晓红博士学位论文《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写的序言是《佛教东传与中国早期白话小说》。

为2001级邱昌员博士学位论文《诗与唐代言言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写的序言是《唐代“诗入小说”现象及其文学史意义》。

为2002级王颖博士学位论文《才子佳人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写的序言是《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史论——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

为2002级余丹博士学位论文《宋代言言小说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写的序言是《宋代思想文化及文言小说的流变》。

为2003级聂春艳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与实学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写的序言是《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

这些序言不仅涉及到古代小说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涉及到一些方法论的问题。所谓“教学相长”,我的序言多借助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不可避免地表达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另外,在此期间,我还与聂付生、杨彬、刘延乾、汪俊文合作,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影响研究》,围绕这一课题也写了几篇文章。收入本论文集的《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一文是我与聂付生合写的,《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影响》一文则是我与杨彬合写的。

大体而言,本论文集集中所收文章大多是我最近十余年所作。因为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的,所以集合到一起。特别是这些论文贯串了我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集中到一起,方便于学界同仁的翻检,并希望藉此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对于治学,我一向主张“求实、创新、循序渐进”。编完这本集子,我深深感到,虽然自己沉浸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三十余年,但近年来各方面显然没有太大的进步。何满子先生希望我能写出一部新的《中国小说史》,并将他的这一希望写入了他的“口述自传”(《跋涉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这无啻是对我的一个鞭策。然“学然后知不足”,如果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即使我将来有时间和精力,似乎也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最后,借此机会,向多年来对我的人生和学术研究工作给予过帮助的人们,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诸多学界同仁,包括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祝你们健康、快乐。

2012年12月12日于上海寓所

目 录

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与科举选官制度论略	1
唐代“诗入小说”现象及其文学史意义	17
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	36
唐张文成及其小说《游仙窟》	44
译经、讲经、俗讲与中国早期白话小说	84
宋代历史文化及文言短篇小说的流变	104
《三国演义》:中国古代的“亚史诗”和“亚经典”	118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	121
《三国演义》第一回浅说	134
附: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	138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	146
关于《西游记》	172
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概说	174
《封神演义》的多维阅读	193
《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200
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	228
关于冯梦龙研究	231
《醒世姻缘传》第十四回	234
李渔小说创作论	239
蒲松龄与科举	
——从《司文郎》谈起	260
《子不语》:才子“志怪”书	263
出入“乾嘉”:李汝珍及其《镜花缘》创作	270

《镜花缘》中的“女儿国”	287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衰及其研究刍议	292
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史论	
——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	304
关于中国小说史上仿作和续书问题的思考	341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泛论	345
古代“禁毁小说”散论(六篇)	354
古代短篇小说散论(五则)	389
关于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401
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	404
关于《红楼梦》及其它古代小说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408
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	416
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	419
二十世纪古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三篇)	426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446
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成书与渊源	459
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472
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 的创作流传	485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512

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与科举选官制度论略

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选官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

从隋王朝开科取士,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了社会成员上、下层之间及“知识精英层”内部流动的“规则”,又使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整合社会关系体系和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成为保证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其它社会活动正常运行的一种调节机制。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始,就注意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从1615年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 1577—1628)根据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日记等材料编纂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开始^①,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籍达100多种。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当然首先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但与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肯定不无关系^②。

①《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中译本名《利玛窦中国札记》,署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第一卷第五章介绍了当时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全过程。

②1791年法国首先举行文官考试,至1875年文官系统形成。1855年英国在本土开始推行文官考试,1870年使其制度化,欧美国家及日本等纷纷效法。1883年至1893年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完成。

由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优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机会均等”,契合了西方近世以来所提倡的“平等”原则,所以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曾对这一“中国的文官制度”表示赞扬。但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实际上是双重的:既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一种保证,也是中国逐步走向衰弱的根源之一;既有利于古代政治的清明,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体制性腐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使教育走向僵化;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古代学子的光阴,从而从整体上削弱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特别是科举制实行的后期,愈来愈成为科学文化进步的障碍和人性解放的桎梏,在中国尚未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以前,就不得不仓猝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一种“制度文化”,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以往我们在审视中国历史文化时较多注意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科举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所起重要作用的研究。假若我们尝试一下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包括文学现象,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十多年前,我在编校《全唐五代小说》时,就感觉到了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唐代文言小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唐代言言小说与科举恐怕绝不仅仅是人们所常提到的“举子以小说行卷”之类的简单关系。

公元7世纪出现并在8世纪末达到相当繁荣的唐代言言短篇小说,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的成熟^①。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符合散文体小说艺术格范的短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的成熟与西方散文体小说的成熟,道路是不同的。西方学者在追述小说的形成沿革时,无不

①历来人们谈中国小说史,总是从先秦或者汉代讲起。有人认为先秦已有小说,至少汉代已有“小说”,因为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已经列有“小说家”,还开出了一个包含15种“小说”的书单。实际上这些“小说”都不是作为叙事文学的散文体小说。散文体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有一定的形式和美学要求,因而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这是世界范围内文学发展的规律。那种认为小说在中国古已有之,将中国古代小说上溯到汉魏六朝,甚至先秦战国的作法,至少混淆了作为叙事文学文体的“小说”概念与中国古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图书分类学中的“小说”的界线。当代治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已经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尽管大家认识的程度不一样,表达上也有差别,但大体都同意唐代言言短篇小说的大量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的成熟或文体的独立。参见何满子、李时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杰作评注·前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代前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把古希腊史诗(epic)——以神话传说、部落战争为内容的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认作小说的始源。这种说法也许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的“寻根”。“蛮族”的入侵,“基督教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的覆盖,使西方近世小说与古希腊史诗之间的联系实际很模糊。能够确证是西方小说直接渊源的,实际是12世纪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 romance(“罗曼斯”)——一种叙述骑士荒诞不经的冒险生涯和古怪迷人爱情的长篇叙事诗(或称为骑士叙事诗、骑士传奇)。在此之前,则有欧洲各民族的“英雄传奇”(或称为“民族史诗”)^①。当 romance 逐渐向韵散相间转化,散文体小说才初见端倪,欧洲14世纪以后大量出现的散文体“骑士传奇”已被称为“骑士小说”,直接成为欧洲“文艺复兴”中渐次形成的“近世小说”的先导。后来欧洲不少语言(如法语和德语)的“长篇小说”一词在语源上可以追溯到 romance,正是语言对这一文学演进事实的记录。

与西方不同,中国由于没有规制宏大的“神话——史诗”传统,叙事诗远远落后于抒情诗的发达,因此,书面语言叙事的经验只能主要在古代的史书及其衍流——杂史、杂传、志怪书和志人短札中分散地积累,词赋等“美文学”在叙事经验方面的积累则十分有限。这些积累叙事艺术经验的载体篇幅都不大,因此绝非偶然地使中国叙事文学之最高形式的散文体小说只能由短篇小说跨出第一步。于是,中国的史书以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主源,但同时也造成了“小说”对史书的依恋,使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批评,长期与史书和史传文体纠缠不清。中国的史书,特别是《史记》中的传记篇目,为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提供了最基本的叙事模式。而史传的衍流,如杂史、杂传、志怪书等,汉魏六朝以来积累逐渐丰厚——它们由正统的史书派生而成,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史传传统的束缚,所以发展出一种溢出史书的叙事态度和叙事风格,特别是在叙事内容上不断摆脱史书尽可能忠实于史事的要求,记以怪异之事和不同程度的虚构,表现出来“小说化”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汉魏六朝以来大量的杂史、杂传、志怪书,也可以说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直接渊源^②。

大体而言,不管希腊史诗、欧洲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和骑士叙事诗是否实

①如8世纪英国的《贝奥武甫》,9世纪日尔曼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12世纪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之类。

②程毅中已经提到这个观点:“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传记演进而来,无论志怪还是传奇,最初都归在杂传类。”(《唐代小说史话》1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际上一脉相传,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散文体小说确实是由长篇叙事诗孕育的,这其中尽管有从韵文到散文的转化,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文学内部发展的结果。而从史传、杂史、杂传、志怪书,再到小说,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需要完成一个从历史到文学的转变。在中国古代,这一转变的时间是漫长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使中国古代散文体小说脱尽史传的茧壳,必须等待历史提供的“必要条件”,有了这个必要的条件,散文体小说才会真正成熟并成批的产生。正是唐代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为中国古代散文体短篇小说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一个最显明的事实是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且不同于往古的新型读书士子人群,并因此造就了新的时代风习、思想精神,从而无意中造就了“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群体。使散文体小说从创作到接受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从两汉的辟除征召,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的都是察举制。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但隋代时间不长,因此科举制作为完备的选官制度,是在唐朝确立的。唐代设科取士,途径有生徒、乡贡、制举三种,科目则很繁多^①,高宗时,本为临时举行的“制举”成为“常科”^②,与“常选”中的“进士”、“明经”成为唐代读书士子跻身仕宦,特别是取得高位的主要途径,对当时的社会影响也最大^③。三科中,制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是进士、明经考试的延续,或仕途的转扬站,名宦多有明经、进士中试后又举制科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进士、明经更被视为科考的必由之路。当时即使中了制举,但不由进

①《新唐书·选举志》：“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②唐代设“制举”的目的本是为朝廷的临时需要，以待非常之才的，其考试科目与时间都不固定。唐初的制举还类似于汉代的“诏举”，大概到高宗时，就与进士、明经一样，被“例为定科”（《新唐书·选举志》）。但与进士、明经不同，制举考试的科目（内容）与时间仍然是不固定的。唐代制举科目，载籍所列不一。但其中许多科目，只是名称小有变化，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如“辞标文苑”、“文艺优长”、“藻思清华”、“文辞雅丽”、“文辞秀逸”，“辞藻宏丽”、“文辞清丽”等，一看皆知是试文艺词藻的。其实，制举虽然名目繁多，但除试词藻外，其它主要是试经学、试吏制、试军事、试品行，故《新唐书·选举志》以为其中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几种。

③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23—4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士、明经出身,甚至会遭到人的讥讽。在“常举”各科中,明经虽往往与进士并称,但因所考内容比较容易,且录取的人数较多,特别是高宗、武后时,进士科受到特别推崇,明经就很难与进士争衡了。明经出身的人要想取得高位,只能再通过制举。因此在中唐以后的记载中,明经往往大逊于进士。有唐一代科举,以进士科最负盛名,也可以说是当时全部科举的重心,故欧阳修修《新唐书》时说:“众科之目,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盛焉。”(卷四四《选举志》)。

当然,唐人入仕当官的途径,并不全在科举。据《旧唐书·职官志》,除科考外,尚有“流外入流”和“门资入仕”等。以其它途径入仕者在数量上甚至远远大于科举。但所谓“流外入流”,当时被称为“杂色”,在官场受到轻视,很少有人能做到中高级官员;以门荫入仕,所授官最初往往高于科举中式者,但因被看作是袭父祖馀绪,反倒因各种原因很难一路升迁——这种情况在中唐以后尤其明显。至于靠战功取得官职和勋赏的,或由藩镇幕府出身者,多集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间段内;因荐举或进献所著之书得官者属于特例,数量不是很大。因此,对唐代的读书人来说,要争取高官令名,科举,特别是中进士,是最重要的途径。这种情况从高宗、武后时开始,越来越明显。至德宗贞元时,进士大量进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宪宗以后,进士开始在宰相和高级官僚中占据绝对优势,以至以其它途径入仕者,“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韩昌黎集》卷四《上宰相书》)。到了唐末,百分之九十的宰相已都是进士出身了。

唐代把登进士第喻为“登龙门”,称一个读书人一旦登科后,“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台阁清选,莫不由兹”。这无疑激发了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同时科举制在当时,对社会各阶层来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汉魏以来的察选制,其对象不外世家贵族,以至形成“上品无寒族、下品无高门”的现象。在唐代,则读书人几乎不分门第高下,不问世族寒门,都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参加科举。也就是说,科考在一定程度上为几乎全社会的读书人提供了竞争机会,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美梦成真。实际情况当然不可能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每年千余名举子集于长安,所谓“麻衣如雪,满于九衢”(牛希济《荐士论》),但考取进士者不过二、三十人^①,绝大多数人只有承受落第的痛苦。故唐代诗文、笔记、小说中多有反映落第举子悲惨命运的。

不过,在唐代确实有不少出身寒门的读书人通过科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①唐代实行进士试的 275 年间,平均每年取进士 20 余人,最多的一年是高宗咸亨四年(673) 79 人,中唐以后每年录取在 30 人左右。

考中进士的甚至有出身于工商市井之家者。如《北梦琐言》卷三所记:盐商之子毕誠,中进士第始“落盐籍”,后位致台辅^①;成都人陈会,本酒家子,曾因不扫街,遭到官吏的殴打,后矢志修进,中进士,官至彭、汉二州刺史。甚至还有贾岛、刘柯以僧人还俗中进士,“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晚唐诗人曹唐则以道士出身中进士。这些人在唐代擢进士第的人中间虽为特例,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参加科考者确实出身广泛,而其中出身寒素者不在少数。五代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纓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唐代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特别是高宗、武后以后的进士考试,使不少出身较低的读书人得以改变自己的地位,进入统治阶层,也使不少世族高门门庭衰落,从而造成社会各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结构格局。关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已经注意到:

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涂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权,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②。

与此相联系的是,科举考试制度,作为新的价值取向,刺激了唐代社会各阶层读书作文的热情,不仅较之往古读书人大大增加,而且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以科举为轴心的新型读书士子人群——或可称为“科举士子人群”。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③,却共同生活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引力场中,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心理,并围绕科举演绎着他们各自的人生。

唐代科举制所形成的科举士子人群,是一个迥异于前代的知识人群。他们不同于以往主要出身于世族家庭的经生儒士——这类经生儒士是以汉魏六朝以来的世族政治、世族经济、世族文化为基础的。科举士子是科举制度的产物,

①毕誠,两《唐书》有传。《新唐书》卷一八三本传谓其“世失官为盐估”,“大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中”,后官至“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称疾,改兵部尚书,罢,旋兼平章事节度河中”。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③唐代实行科举制,扩大了出身于高门大族以外的其它阶层读书士子的进取之路,相对限制了高门大族在权力竞争中的优势。可是一些高门大族,依然能通过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插手科场,把持选拔,力求使自己的子弟通过进士试,在中央和地方上取得要职。但即使是出身于魏晋六朝以来世族豪门的读书人科考中式,这些人也已经经过科举的“洗礼”,身不由己地融入了“科举士子”的行列。

在很大程度上是世族政治、世族经济、世族文化的对立面和破坏者。武后专政以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削弱。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考试的被强调,进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从而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政治权力格局,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科举士子人群冲破魏晋以来世族门阀的坚壁,通过科举取得了政治、经济利益以后,必然会在社会精神领域来表现自己。唐代文学的兴盛与演进,应该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编校《全唐五代小说》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中,科举中式和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尤以进士及第和参加过进士考试的人为最多。另外,还有一些人,或由方镇幕府入仕,或因荐举得官,或亦有科举的经历。再考虑到唐人小说不少作者生平无考,不能排除其中也会有科举士子。如是,则唐代文言小说的作者的中间力量,应该就是这批科举士子。

唐代实行的科举选官制度,不仅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而这正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精神气候”^①,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得以成熟的历史“必要条件”。

先从唐代科举士子的狎妓行为说起。前人所谓唐人“好文尚狎”,无非说的是一种读书士子的风习。这种时代风习不仅是当时科举士子的一种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反映。所以陈寅恪说:“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妓文学有密切关系。”^②行为放浪,不为礼法所羁,实为唐代科举士子有别于汉晋以来世族文化背景下经生儒士的重要标志。

唐代娼妓业十分发达。除隶属教坊、梨园的宫妓外,还有营妓和地方上的官妓。此外还有买卖蓄养家妓的风习,白居易诗所谓“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

^①法国艺术史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在《艺术哲学》中曾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傅雷译本9页、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花三四枝”即指此。市妓的发展亦很快,首都长安、东都洛阳市妓人数、妓院规模当时已经颇为可观,而且形成了居馆迎客和应召出局两种服务方式,暗娼亦很多。其它大城市,如扬州、益州等,也有不少市妓^①。娼妓的繁荣,是古代都市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但对唐代科举士子来说,挟妓冶游在相当程度上却另有其意义。

有唐一代的首都长安,是娼妓最集中的地方。《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云:“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孙棨《北里志序》所记则更为详细。唐代的科举士子来自四面八方,远至交趾(今越南地方)、新罗(今朝鲜半岛)。为求科举,这些读书人远别家庭,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京都,有的甚至长期在京师滞留,希望通过狎妓得到某种羁旅生活的藉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本不足怪。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狎妓冶游已经不是科举士子个人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与科考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士子的一种“风习”。

唐代进士发榜后有许多次宴集,其中尤以曲江宴最为著名。这类宴集无不邀请妓女参加,其相聚追欢的场景,萦绕进士的一生,使之永难忘怀,唐人诗歌与笔记多有记载^②。特别是挟妓宴游已经形成唐代进士登第后固定的活动,成为新进士体现自身价值和显示荣耀的一种形式,也对科举士子生活方式起到某种示范作用。而科举士子对这类放浪不羁活动的张扬,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他们在精神上对“礼法旧门”的挑战。唐代文人小说中描写科举士子冶游生活和婚外恋的名篇《游仙窟》、《李章武传》、《非烟传》(《全唐五代小说》卷六、卷二四、卷七〇)等,所表现出来的对名门望族礼法的不以为意,也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自觉不自觉的体现。这种美学的新内容正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表现了一种创作主体的精神蠢动。

唐代文言小说大量描写科举士子与妓女性爱关系或感情纠葛作品的出现,无疑与作者冶游生活的经历有关。其中不少小说都能在逶迤曲折的情节中,铺陈出生活的细节,把握住情感的微妙,将男女主角的行为心理刻画得真切自然,

①于郾《扬州梦记》:“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故张祜《纵游淮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楼上看神仙”之句,杜牧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姓名”的感慨。

②也有进士直接写自己平康买笑的经历,如《唐摭言》卷三记裴思谦、郑合敬进士及第后去逛平康里,留宿以后,还写诗夸耀。郑合敬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馆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梦醒,时时闻唤头头声。”欢快得意之情溢于言表。